河洛广记

且道官瓷出洛京

——洛阳古瓷记之三

□郑贞富

曹魏、西晋和北魏时期,是瓷器成熟后的第一个重要发展阶段,瓷器生产由初级向高级发展,各种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、新方法相继出现。而每出现一种新事物,就把瓷器生产推向一个新高峰,并对以后瓷器发展产生重大影响。其中,最重大的事件,是洛京窑的出现和白瓷的发明。

倾缥瓷以酌醽

东汉末年,发生董卓之乱,董卓焚烧洛阳,挟持洛阳及周围百万人口进关中。《后汉书·董卓传》说:“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,悉烧宫庙官府居家,二百里内无复孑遗。”经过董卓之乱,洛阳境内除了深山区基本无人。《晋书·食货志》曰:“自董卓之乱,百姓流离,谷石至九十万,人多相食。”当时,北方出现“白骨露于野,千里无鸡鸣”的局面。

曹操统一北方后,大兴屯田,户口稍增。魏文帝建立曹魏政权后,迁各地民众入洛阳,并分散到各县。《晋书·地理志》载,魏明帝去世后,司马懿主政,朝廷从邓艾计,在淮北、淮南屯田,“自寿春到京师,农官丘田,鸡犬之声,阡陌相属”。到西晋代魏后,《晋书·食货志》说,洛阳一带出现“荷锸羸粮,有同云布”。

魏晋逐步在都城洛阳设立管理官营手工业的专门机构,有少府、卫尉和将作大匠三个系统,下辖多个官营手工业作坊,其中就包括制作瓷器的作坊。

魏晋时瓷器的应用已很普遍,为了区别瓷器和陶器,新造了一个汉字“瓷”。潘岳是西晋洛阳文士首领,他的《笙赋》曰:“披黄苞以授甘,倾缥瓷以酌醽(líng)。”意思是剥柑橘皮而食果肉,用青瓷以饮酒。缥,原是晋代一种淡青色的丝帛,青瓷的颜色很像这种缥,故借缥以名瓷,称为缥瓷。这是“瓷”字最早见于文献中,也是瓷器这一事物大量、普遍存在于社会中的客观现象的反映。

洛阳出土了不少精美的西晋瓷器,如1974年在洛阳矿山厂西晋墓中出土了一件狮形青瓷盂。狮昂首竖耳,双目圆睁,四肢蹲卧,通体施青釉,釉层匀净,形象生动。在偃师城关镇变电站也出土了一件兽形青瓷盂。瑞兽四肢前屈下蹲,头部上扬,满身卷云毛纹,通体施淡青色釉,造型别致。

西晋短期统一后,出现“八王之乱”和“永嘉之乱”,西晋灭亡,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民众大举南迁,形成客家人,把北方制瓷工艺也带到南方,与南方的制瓷工艺结合,形成东晋和南朝青瓷生产的繁荣。

营洛京建造官窑

西晋灭亡后,北方进入长期的混乱状态。北魏是鲜卑拓跋部创立的国家。在北方大乱中,北魏逐步壮大势力,统一黄河之北,此后渡河南下,与东晋、南朝争锋于河洛,占领中原,成为与南朝隔淮河对峙的大帝国。

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,光宅土中,进行汉化改革,促进了北方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。洛阳作为北魏都城,经过大规模营建,又出现宫阙巍峨、商贾云集的景象。

北魏大力发展官营手工业和民营手工业,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建立瓷器官窑,即洛京窑。清代蓝浦《景德镇陶录》载:“洛京陶,亦元魏烧造,即今河南洛阳县也。初都云中,后迁都此,故亦曰洛京所陶,皆供御物。”这里的“陶”指“瓷”,因此民国时期著名陶瓷学家叶麟趾在其《古今中外陶瓷汇编》中引用此书说:“洛京窑,亦元魏烧造,即今河南洛阳县也。初都云中,后迁都此,故亦曰洛京,所烧即供御物。”又据洛阳出土的元乂墓志云:“其妻为胡太后之妹,在乂卒后,殡葬从优……赐以明器,发卒卫从,自都及墓。”因此北魏豪门贵族墓出土的随葬瓷器,应是北魏洛京窑的“供御物”。

《洛阳伽蓝记》记载,洛阳城东北有“上高里”,“殷之顽民所居处也。高祖迁京之始,朝士居其中,迭相讥刺,竞皆去之。唯有造瓦者止其内。京师瓦器出焉”。因此,洛京窑应当在这一带。

但是,洛京窑的作坊区,可能并不止上高里一处,在洛阳周边还应有不少作坊区。比如,巩义白河窑址,也可能是洛京窑的一个作坊区。

洛京窑以烧制青瓷为主,这种青瓷,在北魏宣武帝景陵等洛阳北魏陵墓中多有出土。洛京窑的瓷器坯料选用水平提高,可以根据不同产品配制成分不同的坯料,从而得到色泽不同的胎体;在成型工艺上,采用了多种技法;用化妆土美化瓷器,即先用纯净的瓷土制成浆液,施于胎体表面,然后再上釉;能配制成含铁量不同的釉料,烧制成多种色调的釉;窑炉结构进一步改进,使用垫具、匣钵的窑具,提高了烧制技术和瓷器质量。这些新技术的运用,使洛京窑的制瓷工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

洛阳出土的北魏白瓷杯(资料图片)

最早白瓷出洛京

洛京窑不仅烧制青瓷,也烧制出了最早的白瓷。白瓷最早的实物,是在汉魏洛阳故城北魏大市遗址出土的两件北魏白瓷杯。

瓷器釉的颜色,主要由釉中呈色剂所决定。釉中呈色剂最重要的是铁的氧化物。釉中含铁量愈高,釉色愈深,由青到褐到黑。反之,釉中含铁量愈低,釉色愈浅。当釉中铁的含量低到一定标准以下时,釉的颜色就会浅到无色或白色,这种无色或白色釉瓷,就是白瓷。

巩义白河窑址出土有白瓷,与北魏大市遗址出土的白瓷工艺相同。同时,白河窑有白瓷与青瓷同窑烧装的现象。由此说明,白瓷是在烧制青瓷的基础上,逐步降低釉中的含铁量实现的。这是中国古代制瓷技术的重大突破与进步,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,并为后来各种色彩的瓷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公元534年,北魏分裂为东魏、西魏,东魏权臣高欢将洛阳居民迁至东魏的都城邺城,洛京窑的工匠也被强制随迁。安阳相州窑随后大批量烧制技术非常成熟的白瓷,从中可以看出洛京窑与相州窑有传承关系。此后,白瓷工艺在北方传承,逐步发展成为著名的大唐官窑白瓷。

走近第四批市保

王黑子楼

王黑子楼和保留至今的老街 刘冰 摄

王黑子楼全景(新安县文物局提供)

王黑子楼又名望京楼,位于新安县仓头镇孙都社区,为明末当地丝绸富商王黑子所建,现仅存楼基和门洞。楼基长22.5米,宽21.5米,高约15米;底部以大条石垒砌,8米以上以大青砖砌筑;墙厚约1米,以石灰、糯米汁砌筑,中填黄土。楼基底部北侧有一拱形门洞,为居民日常行走的通道。

楼基北侧建有砖窑,窑后曾有一暗道直达楼顶,现已不存。

王黑子楼于2017年12月入选洛阳市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,其不仅仅是一座观景楼,还是一座为防匪防盗、躲避战乱而建的碉堡式建筑,为研究明清时期的防御建筑及民风民俗等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。

本报记者 苏楠 通讯员 李明

河洛水韵

扑朔迷离永济桥

□乔文博 文/图

古桥墩

昔日永济桥的位置现筑起了橡胶坝

有唐一代,永济桥曾以国内四大石柱桥之一的身份闻名于世。《唐六典》载:“天下石柱之梁有四,洛三灞一。洛则天津、中桥、永济,灞则陕西之灞桥也。”《旧唐书》亦载:“天下……石柱之梁四,洛则天津、永济、中桥,灞则灞桥……皆国工修之。”这里所说的“洛”“灞”,是指洛水和灞水。

永济桥在哪里?

旧《宜阳县志》上两说并存:“永济桥,元和志(即唐《元和郡县图志》)以为在寿安县(今宜阳县)西,李通志(即明李濂纂修之《河南通志》)以为在宜阳县东十七里。”究竟在县西还是县东,县志的说法模棱两可。不过,关于桥的形制,县志倒是给出了合理的解释:“元和志谓永济桥造舟为梁,而六典(指《唐六典》)以为石柱之梁者,盖始则造舟为之,其后易以石脚耳。”即永济桥最初是用木船连接的浮桥,后来改成了石柱桥。改为石柱桥的时间,当在《唐六典》成书的开元二十六年(公元738年)之前。

《宜阳县志》永济桥条目后有一段考释文字,大意是说永济桥的遗址老辈人相传在李家营村东,南通周村北对八关寺(今邵窑),因时间久远淤埋在河滩下,本已难以分辨,但清代嘉庆年间(约1810年前后)洛河发大水冲毁了北岸,露出了无数桥石。桥石全为正方,用铁卡钩连,大的石块需专车装载。桥面木板有一尺多厚、一两丈长,用来做家具很好(可见未曾腐朽)。后来每逢涨大水,往往有桥石塌出,还能大致看出基址的模样。县志上的这段记载以父老相传和洛水冲出的桥石为据,证实了《河南通志》永济桥在宜阳县东十七里的说法。

那么宜阳县西的永济桥是怎么回事?查阅有关资料后可知:隋唐时期的永济桥在县西。唐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载:“永济桥,在县西十七里。炀帝大业三年置,架洛水。隋乱,毁废。贞观八年修,造舟为梁,长四十丈三尺,广二丈六尺。”能佐证这座桥位置的,还有宋代的《元丰九域志》:“唐柳泉驿当即在宋柳泉镇东,距永济渡桥约十三里。永济渡,在河南寿安县,有浮桥,桥坏,即为渡。”两段文字表明:永济桥始建于隋大业三年(公元607年),最初是座“造舟为梁”的浮桥,隋末桥废,唐贞观八年(公元634年)又在原址重修。

2012年3月下旬,洛河灵山段橡胶坝动工修筑,坝址在桥头村北原水电站拦水处,这使得一座湮没水下一千多年的古代名桥进入了人们的视野。3月25日,工人们在开挖坝基时有了惊人的发现:水底沙砾层下,一米见方的青色石块挨挨挤挤,或横斜排列,或彼此压叠,一时难以数计;石块之间,偶见胸围径尺的木质桩基深入地下,虽有年头却未见朽腐。现场的人们有过各种猜测,是古代的船运码头?是过去的石质桥墩?众说纷纭。地方史志学者走访了施工人员和当地群众,确认这便是著名的隋唐永济桥。

灵山段永济桥石柱基的发现,证明了宜阳历史上曾有过两座永济桥,隋唐时在县西十七里,明清时在县东十七里。至于什么时候移到了县东,是谁主持修建的,又是什么时候毁弃的,仍有不少历史之谜待解。

扫一扫,关注“人文河洛”(renwenheluo)

“人文河洛”系《洛阳日报》品牌之一,让我们在这里触摸河洛大地的人文底蕴,感受洛阳历史的厚重魅力。